

明清时期两浙儒学的演变与定位

诸凤娟 钱明 宣绍龙¹

【摘要】历史上围绕“浙学”展开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宋明以来浙江人以及浙江儒学评价标准的严重分歧，而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明代浙江儒学自然成了此后对峙各方的主要靶点和首要争论点。总结以宋明时期为中心的浙江儒学发展史，应该在适当调整和补充的前提下，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基本路径和操作模式。尽管《明儒学案》中对王门诸子所作的抑扬、褒贬性的比较研究带有不少成见和偏颇，但黄宗羲所选择的明代人物、梳理的几条主线，还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客观依据的。而黄宗羲以阳明心学为主线编撰《明儒学案》的理念和方法，其实并非其首创，明人刘鳞长在任浙江提学副使时所编撰的《浙学宗传》可谓其先河。刘著的意义不仅在于突出了浙江心学传统的一脉相承性，而且在于第一次将在学术上一直受冷遇的“浙西”之学也纳入他们的考察范围。

【关键词】浙学 儒学 心学传统 浙东 浙西

一

从自然地理上说，现在的浙江共分为十一个地区：杭、嘉、湖、甬、绍、金、衢、台、丽、温和舟山。但在过去，浙江却长期以钱塘江为界而被分为“上八府”——严（后并入杭州）、宁（后分出舟山）、绍、金、衢、台、温、处（即丽水）与“下三府”——杭、嘉、湖，并逐渐形成了文化地理上的“两浙”区划，即“上八府”的“浙东”和“下三府”的“浙西”。故此，“两浙”既是自然地理上的概念，更是文化地理上的概念。

所谓“明代浙江儒学史”，自然应包括“浙东”与“浙西”，但以“浙东”为主乃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因为，无论在自然地理上还是在文化地理上，“浙东”自古以来就传承并代表了“古越”文化的精髓，而“浙西”的大部分则与吴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清时期的浙东士人对乡邦文化尤其是包括阳明心学在内的浙东学术，无不怀有强烈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其主因盖在于此。

比如明末遗民林时对（1623—1664，字殿扬，号茧庵，鄞县人）曾说：“本朝一代伟人，皆吾浙产也。刘文成之谋略、王正学之惨忠、于忠肃之戡定、王文成之理学、倪文正之文章气节，求之汉、唐、宋不多见矣。”¹林所言“浙产”，实指浙东所产。黄宗羲亦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阳明学、戴山学及整个浙东学术文化的高度赞誉：“向无姚江，则血脉中绝；向无戴山，则流弊充塞。

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²甚至认为“正法眼藏，似在吾越中”³。此类评价，虽有点自誉自恋，但亦基本反映了明代浙东学术文化的兴盛程度及其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因此可以说，浙东人士对本土学术文化具有高度认同感并对本地域既“不废风雅”又有“忠义之盛”的民风满怀自豪感，乃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浙东之外的人士就未必这么看了。比如清代关中儒、恪守程朱理学的李元春即声称：“吾儒之学亦且分党而角立，指其名则有记诵之学，有词章之学，有良知之学，今日又有考据之学，而皆不可语于圣贤义理之学。汉儒，记诵之学也；六朝及唐，词章之学也；良知之学，窃圣贤之学而失之过者也；考据之学，袭汉儒之学而流于凿者也。独宋程朱诸子，倡明正学而得其

¹作者简介：诸凤娟，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教授；钱明，绍兴文理学院鉴湖学者讲座教授；通讯作者宣绍龙，绍兴文理学院副教授。（绍兴 312000）

精。通世顾横谿之亦大可感矣。”⁴

其把儒学限制在“圣贤义理之学”即程朱理学的范围内，而以“良知之学，窃圣贤之学而失之过者也”为由将占据明代儒学主导地位的王阳明心学排除在外。这样的看法在当时并不占少数，尤其在北方地区，甚至还包括同属浙江的“浙西”。比如湖州归安人李乐的《见闻杂录》就曾故意借用北宋名臣、唐朝名相杜佑之后杜衍（978—1057，字世昌）的话说：“杜正献公（衍），越州人，尝戒门生曰：‘天下唯浙人褊急易动，柔儒少立。衍自在幕府，至于监司，人尚不信，及为三司副使，累于上前执奏不移，人始信之。

吾子慎勿为时所上下也。’（按：语出《宋名臣言行录》卷七，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十亦有引述，足见对浙人，宋人评价颇为负面）李子曰：‘凡吾浙人，可以自考自勉。’”⁵认为浙人气量狭小，性情急躁，且柔儒而少有建功立业者，这样的负面评价显然有失公允，不过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人对宋明以来浙江人包括浙江儒学评价标准的严重分歧，而以阳明学为代表的明代浙江儒学自然成了此后对峙各方的主要靶点和首要争论点。

那么，我们今天来总结以宋明时期为中心的浙江儒学发展史，究竟应当按照什么标准或路径来作取舍、定位并进行叙述呢？我们的看法是在作出适当调整和补充的前提下，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基本路径和操作模式乃是一条较为现成的方便“法门”。尽管《明儒学案》中对王门诸子所作的抑扬、褒贬性的比较研究带有不少成见和偏颇，将其视为一家之言也许更为合适，但黄宗羲所选择的明代人物、梳理的几条主线，还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客观依据的，尤其是他所展现出的理性目光和学术胸怀，在当时很难有人能出其右。⁶

尽管儒学大师钱穆曾说：“则梨洲之必抑浙中、扬江右，其无当于当时王学之传受之真相，亦可知矣。故今日治王学，于《传习录》上、中、下三卷，固可以分别而观，亦当会合而求。于江右、浙中之相异，于绪山、龙溪论学之不同，固亦当分别而观，但仍当会合而求。而梨洲《学案》，则承自戴山，而实未得戴山之深旨。若即据此以作王学之衡评，则又未见其有当也。”⁷

但我们只要避免教条式地把《明儒学案》对阳明学者及其他明儒的评论作为“衡评”，而只把《明儒学案》为我们梳理、列出的主要脉络和主要人物作为总结明代浙江儒学发展史的基本路径，采取“分别而观”与“会合而求”相结合的方针，就不难写出符合明代浙江儒学发展之实况的断代学术思想史。

当然，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绍兴府余姚县人，他在编纂《明儒学案》时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偏袒乡贤的潜意识，故其所撰的《明儒学案》以浙江学者为主也是合情合理的，而其地域之视野和明儒之分布，即可作为此“情”此“理”的有力支撑。

如果将整部《明儒学案》作一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该书中浙江尤其是绍兴地区的学者所占比例是最高的。有学者曾根据《明儒学案》的人名索引作过统计，能够明确地望的儒者共有 241 人，其中浙江籍 47 人，占 19.5%，居江西之后。但若以县论，超过 10 人的全国只有三个县，浙江占两个，即余姚和山阴，都在绍兴府。如果按府级单位计算，绍兴共有 25 人，居全国第一。

8

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在《儒林宗派》卷十五“王氏学派”中则收录了 470 余名阳明的门人后学，其中浙江籍的有 57 人，江西籍的 60 人，浙江虽略少于江西，但明显多于江苏⁹、安徽等阳明学重地。而浙江籍中，又以余姚最多。这无非是因为，浙江乃阳明学的创设之地，又是黄宗羲、万斯同的家乡，他们编撰《明儒学案》和《儒林宗派》以浙江学者居多，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江西则是阳明经营时间最长、出版重要著作（如《传习录》《大学古本旁证》《朱子晚年定论》等）最早的省份，加上其他历史的、自然的、文化的等诸多因素，所以阳明学在江西的发展后来居上，超过浙江，亦属正常。问题是，黄宗羲还有意识地把浙江的阳明学者分别置于浙中、泰州、甘泉等数个“学案”以及“附案”中，从而人为地使浙中王门在与江右等地区王门的力量对比中，从开始时的上风转为了下风。其中之原委，本书的说明尽管不充分，也不明确，但也有所涉猎，认真深思，应不难得出

结论。

与此同时，黄宗羲在梳理并论述明代浙江儒学史时，还为我们揭示了一些重要特点，并将其归结为“讲学”一门。如黄氏的《明儒学案》序曰：“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于讲学，余妄谓过之。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之为数家，终身学术，每久之而一变。”¹⁰

而这段不见于《明儒学案原序》¹¹的重要论述，却在《明儒学案发凡》中以另一种表述方式得到了重申：“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¹²黄氏此处所说的“讲学”，主要指的是精英层面的学术活动和思想创设，并且把目标集中于浙东。在他看来，明代儒学即所谓“理学”，正是通过这样的“讲学”活动才获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发展。

而黄宗羲所言的“浙中”，指的是包括古人所谓“浙东”和“浙西”在内的整个浙江。浙中王门可细分为绍兴王门、余姚王门、嵊州王门、宁波王门、金华王门、衢州王门、台州王门、温州王门、湖州王门、嘉兴王门、杭州王门等，其代表人物有阳明先生的亲传弟子徐爱、黄绾、王畿、钱德洪、季本、陆澄、孙应奎、万表、程文德、卢可久、徐霭、顾应祥、董澐、董穀等，后传弟子周汝登、陶望龄、陶奭龄、张元忬、王宗沐、徐渭等，并皆有王学著述存世。但浙中王门的核心区域是绍兴和宁波。

阳明学说的“发端”实得益于王阳明早年在绍兴时所结交的许璋、王文轵、王琥等“道友”。开始授徒讲学后，其同邑的徐爱、蔡宗尧、朱节等人又成为阳明先生最早的入门弟子。晚年归乡讲学期间，越城的稽山书院、阳明书院和余姚的中天阁成为阳明先生讲学的主要场所。来自全国各地的王学爱好者云集绍兴，气氛活跃，阵势壮观。钱德洪、王畿等人是这一时期入门的浙中王门之代表，他们与来自赣州的何廷仁、黄弘纲一起被世人誉为“善推演师说”的王门“教授师”。

阳明先生去世后，钱、王二人又成为传播和发展阳明学的同门领袖。但钱、王二人对阳明思想的理解存在差异，性格也不同。阳明先生最后一次浙中讲学活动，就是由他们二人引发并展开的，这就是闻名遐迩的越城的“天泉证道”、桐庐的“严滩问答”，并一直延续到南昌的“南浦请益”和吉安的“螺川大会”。此外，金华、衢州、杭州、嘉兴等地是阳明先生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因而也成为王门讲学较为集中的地区，而台州、湖州、温州等地则因有黄绾、陆澄、项乔等重量级人物的存在，亦使这些地区成为浙中王学的重要传播地。

众所周知，讲学活动发展到明代，已日趋繁荣，浙江尤其为盛。从一定意义上说，阳明学的形成、发展与传播，便是建立在浙东地区的讲学、讲会的基础之上的。¹³王阳明去世后，由其弟子、后学创办或修复的书院、举办的各类讲学和讲会活动，可谓不计其数，较具代表性的就有绍兴的阳明书院、稽山书院、阳和书院及证修会、证人社，宁波的中天阁讲会、姚江书院、龙山书院及四明山游学，杭州的万松书院、天真书院、两峰书院、武林书院，嘉兴的天心书院、文湖书院及武林会，湖州的养正书院、静虚书院、一庵书院及岷山社，台州的赤城会及天台山游学，金华的五峰书院、善林书院、松溪书院、龙岗书院、崇正书院及水南会、兰阴会、丽泽会，衢州的衢麓书院、景濂书院、东溪书院及濂江会，温州的鹤山书院、龙渠书院、罗峰书院、半山书院、白马书院等。上述场所及其所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对于阳明学在浙江大地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助推作用。

二

需要强调的是，黄宗羲以阳明心学为主线编撰《明儒学案》的理念和方法，其实并非其首创，明人刘麟长在任浙江提学副使时所编撰的《浙学宗传》（不分卷，明崇祯十一年自刻本）可谓其先河。¹⁴而刘氏正是为了与王阳明再传弟子周汝登（海门）编纂之《圣学宗传》¹⁵相接续，并且为对应于刘氏本人先撰写的《闽学宗传》（不分卷），才编纂了《浙学宗传》。

刘麟长认为，“浙学”与具有朱子学传统的“闽学”具有共同的思想资源和学术传统，亦是对孔孟圣学的继承和发展。“浙学”的源头，从远的说源自于尧、舜、文、周、孔、孟，从近的说源自于杨时、朱熹、陆九渊，而“浙学”的始祖则为浙西的张九成

（横浦）和浙东的杨简（慈湖）。从《浙学宗传》中所录历代儒者中可以看出，刘鳞长所言之“浙学”，指的正是宋、元、明时代包括“两浙”在内的整个浙江省域的“心学”之流脉。¹⁶这一点在他所撰的《浙学宗传序》中表现得尤为清晰：

于越东莱先生与吾里考亭夫子问道质疑，卒揆于正，教泽所渐，金华四贤，称朱学世嫡焉，往事非邈也。擎榘姚江，溯源良知，觉我明道学，于斯为盛，今岂遂绝响乎？缘念以浙之先正，呼浙之后人，即浙学又安可无传？周海门《圣学宗传》尚矣，然颇详古哲，略于今儒。乃不揣固陋，稍稍编彙成书，梓且行。……今夫尧、舜、文、周、孔子、孟氏，万世知觉之先。大宗之祖，闽与越共之，不具论。论澜近宗，则龟山、晦庵、象山三先生。

其子韶、慈湖诸君子，先觉之鼻祖欤。阳明宗慈湖，而（按：疑脱“弟”字）子龙溪数辈，灵明耿耿，骨血相贯，丝丝不紊，安可诬也？……然而此点灵明骨血，还注当身，一加濯磨，无难昭灼，反而求之，便登吾宗谱牒，亦于心学加之意而已。圣为学宗，心为圣宗。苟得其传，毋论子韶、慈湖而下，堪称慈父，行且尧、舜、周、孔，同我正觉。……了心入圣，为宗门中大觉，至孝而为难；不明心学，即堕落于罔觉，不孝而不可药救。所贵还返个中，认正宗传，学恒于斯，教恒于斯，则若闽若浙，同属家亲，而大宗小宗，共登上岸矣。¹⁷

对于刘鳞长以“两浙”的“心学”传统为“浙学”之主流的观点，清代四库馆臣们的评论也比较有说服力，声称《浙学宗传》是“采自宋迄明两浙诸儒，录其言行，排纂成帙；大旨以姚江为主，而援新安以入之”¹⁸。刘鳞长的目的，就是要将“浙学”与“闽学”的传统贯通在一起，使“心学”与“理学”不仅在源头上“同属家亲”，而且在传承过程中亦彼此相互照应，所以其中的明代部分理所当然地要以阳明心学为主线。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把“心学”尤其是阳明心学视为浙江儒学思想传承与发展的主流或“宗传”的理念，其实在刘鳞长之前即已在浙江学界有了萌发，比如折中王（阳明）湛（甘泉）的湖州籍的儒学名家蔡汝楠¹⁹就曾明言：

吾浙学自得明翁夫子（阳明），可谓炯如日星，然及门同志，海内间有未信，至目为柔要颓惰，要亦功利习气有一二逗漏处被人觑破尔。取益岭海，掇此金针，知吾伯丈（张浮峰）不但自跻至域必有所以发明师训，兴起漏习行自浙中以遍天下者，又何幸！何幸！²⁰

永丰（聂豹）则谓我浙学承阳明夫子之绪，如曹溪以后谈禅，非来本意矣。²¹

蔡汝楠是阳明弟子，也是阳明门下较早出入王湛的“浙西”之代表，因此他所主张的以“浙学”来命名的明代浙江儒学，其实就是指“两浙”区域的阳明心学。可见，蔡汝楠的“浙学”概念相比刘鳞长的“浙学”概念，尽管“空间”上是相同的，特指“两浙”地区，但“时间”上却被压缩在明代。

不难看出，刘鳞长等人将“浙中”即“两浙”地区的心学传统视为承续“闽中”朱子学而兴起的浙江儒学的主流或“宗传”，虽然带有强烈的乡土情怀与门户之见，但却颇有创见性，其意义不可谓不深远。

具体地说，刘鳞长等人所揭示的“两浙”地区的心学传统，其意义不仅在于突出了浙江心学传统的一脉相承性，而且在于第一次将在学术上一直受冷遇的“浙西”之学也纳入进他们的考察范围。事实上，“浙西”之学虽然与“浙东”之学存在着明显差异，然而亦不无相当密切的同源性和互动性。

至于把心学尤其是阳明心学作为浙江儒学之传统或“宗传”的观点，可以说是在失之偏颇的同时，而无意中揭示出阳明学与宋代以来“浙学”传统的内在联系。这是因为，若就心学与史学、经学或经世致用之实学相融的浙江儒学的根本精神而言，王阳明及其“浙中”弟子的学术理念和实践可以说是这一根本精神的最好诠释之一。这其中，既有王阳明的“六经皆史”和“道即事、事即道”所代表的心学理念，更有其弟子后学重心学又重史学、经学或经世致用之实学的学术范式和操作逻辑。

比如钱德洪等人重视“事上工夫”尤其是阳明文献学并使其心学化的实学形态，顾应祥等人重视百科技艺及其心学化的格致学形态，张元忭等人重视修史尤其是地方史和当代史的心学化的史学形态，季本等人重视经史制度之学并使其心学化的经学形态，等等。²²因此，“两浙”尤其是“浙东”的阳明学者，既有实学实用的目标诉求，又有独立思考、冲破传统的思想合力。

也就是说，阳明学所蕴藏并统合的形而上之心性本体与形而下之日用功夫，在明中叶以后的浙江儒学传统中都能找到其源头活水。这就是与以张九成、杨简为代表的心学和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的有机衔接，以及对吕祖谦等为代表的理学化的史学和以程朱学为主干的明初金华儒学的内在受容。从一定意义上说，王阳明以后浙中王门的演化，就是沿着浙江儒学传统中的这几个方向而渐次展开，并最终在刘宗周、黄宗羲等人那里被集大成的。

因此，我们在总结宋明时代浙江儒学发展史的时候，应始终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将以阳明学为代表的心学传统视为贯穿明代浙江儒学的基本流脉和主导线索；二是将“浙西”也纳入明代浙江儒学的考察视野，而且与《明儒学案》相比，还要作适当的“放大”，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在我们看来，惟如此才能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出明代浙江儒学的整体面貌和发展态势。

三

一般来说，浙江儒学史的萌芽期是在秦汉至五代时期，高峰期是在被称为“近世”²³的宋元明清时期。从学术风格上看，明代的浙江儒学应包含宋代道学一脉的洛学传统和心学传统。故明代浙江儒学不仅内含史学、经学和制度之学，更有“性学”（杨维禎语）与“心学”相结合的心性学传统；既有朱子后学的影响，又有象山后学的传承流变。这就使得明代浙江儒学的各种流派之间，呈现出彼此交错、相互融合、汲取与批评兼备、复杂而多元的学术品质。

对于宋明时期的浙江儒学发展史，明中叶的归有光曾作过一个评价，他说：“浙东道学之盛，盖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何基）得黄勉斋（黄幹）之传，其后有王会之（王柏）、金吉父（金履祥）、许益之（许谦），世称为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为黄晋卿（黄潜），而宋景濂（宋濂）、王子充（王祯）皆出晋卿之门。高皇帝初定建康……当是时，居礼贤馆，日与密议，浙东儒者皆在。盖国家兴礼乐、定制度，建学养士科举之法，一出於宋儒，其渊源之所自如此。”²⁴

尽管归有光严厉批评了“浙东学者近岁浸被阳明之教，为致良知之学”的学术思潮，而以阳明心学为浙江儒学发展之异类，却从学术传承和思想发展的视角肯定了浙江儒学注重经、史、制度之学的优良传统，并将其视为正统儒学的渊源之一。继起于明初的金华浦江的宋濂、义乌的王祯等人，便是在复传程朱义理学的同时，又大量汲取了宋代吕氏文史学以及浙东事功学的传统，表现出了不偏于性命义理之说、重视经史并举的学术倾向。²⁵

明中叶以后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浙江儒学，正是在接续宋元明初这一传统的基础上，一跃成为全国的领头羊和风向标。而王阳明在全国领袖地位的形成，又进一步使后阳明时期出现的几乎所有思潮、流派、形态在浙江全都有所表现，有的甚至居于主导地位，于是导致了“心学化”或“阳明化”在浙江不仅涵盖了宋元以后的事功传统，还涵盖了史学、经学、文学、宗教乃至科学等诸传统，各种学说、思潮纷纷打出阳明学的旗号，或者与阳明心学相融合，或者借用“阳明”而贩卖己之私货，或者成为转化阳明心学的一股潜流。正因为浙江是宋元以来“心学化”运动的主要区域，又是阳明心学的诞生地、传播地和集中爆发地，其中的几股代表性亚流包括极端思潮在浙江也有充分表现，所以心学的终结或理学的终结出现在浙江，实属必然。

因此可以说，明中叶以后风行于浙江大地的王阳明及其后学在被各种传统所摄入、融合的过程中，心学化的文史之学、经史之学等实学形态的出现可谓最具典型性，因而亦成为明代浙江儒学的重要特色之一，其影响还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陈确、毛奇龄、万斯同、邵廷采，乃至清中叶乾嘉期的全祖望、章学诚等人。也就是说，阳明心学不仅占据了整个明代浙江儒学发展的中心位置，而且清代浙江儒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余脉的影响。

然而，明中叶兴起于浙东的阳明学风潮，中晚明时随着其亚流的日趋禅学化、空疏化和没落化，修正、矫正乃至彻底否定的

声浪也开始从微弱变为高调。但修正、矫正乃至彻底否定的声音，当时的浙东远比不上浙西。因为当明代中叶阳明学兴起于浙东的同时，同属心学系统的、诞生于岭南的甘泉学也几乎与阳明学同步兴起于浙西，多数情况下，甘泉学在浙西的声音甚至要大过阳明学。而甘泉心学除了与阳明心学有互补作用外，还可用来对后者进行矫正和修补。

因此到了晚明，修正、批评、反对阳明学的主声浪亦主要集中在浙西，以至于浙西在清初成了彻底朱学化的“异化之地”。相比之下，明代中后期的浙东虽一直也有朱学化的迹象存在，但无论哲学（心性学）还是文学、经学、史学，唱主角的依然是阳明学。

主导“两浙”学术风潮的这两股力量，可谓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虽有交叉互动，但分化分裂亦较为严重。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格局中是不多见的，即使受大江大河阻隔的省区，亦不如“两浙”来得分明。因此，随着阳明学愈来愈受到各方的质疑和批判，浙西的声音和地位亦日渐凸显和重要，于是明代儒学的中心也开始由浙东向浙西转移，而这种转移及其表现形式，则可谓中晚明浙江儒学思想发展的又一亮点。

在这种学术风潮的转移过程中，地处“两浙”交汇点的杭州的地位显得非常特殊，也特别重要，故而在后阳明时期成了各路学术“诸侯”争夺的主战场。这种“争夺”，虽然在阳明在世时就已滥觞，但在后阳明时期显得尤为突出，于是杭州便成了大批浙东学者的聚集地，而非单纯的南来北往的途经地。

随着阳明心学由东向西之扩展，以及批判阳明学的“西风”逐渐压倒弘扬和传播阳明学的“东风”，两浙的儒学发展亦日趋平衡，尤其经过戴山、梨洲等传人的努力，浙西的儒学发展，在某些时段甚至要超过浙东，至少能与浙东儒者同声起舞，同步发信。

注释：

1 林时对：《荷锄丛谈》卷二《两浙人物》，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0 年版，第 25 页。

2 3 10 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 册《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第 211 页、第 11 册《胡子藏院本序》第 63 页、第 10 册第 76 页。

4 李元春：《时斋文集》，卷二《学术是非论》，清道光四年刻本，第 1 页。

5 李乐：《见闻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卷六第 99 条。

6 比如康熙十五年至十九年间，黄宗羲在海宁讲学时，“与越中同人讲贯，亦多依老父母（指当时在海宁任知县的河南硕儒许三礼）宗旨”。参见许三礼《天中许子政学合一集·姚江黄梨洲先生来书》，清康熙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65 册，齐鲁书社 1995 年版，第 73 页。

7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七册，九州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6 页。

8 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9 页。

9 但不包括江苏的泰州王门。屠用锡、王梓材注：“黄梨洲曰：‘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今万氏所列寥寥数人，盖泰州门人之纯者也。’”（《儒林宗派》卷十五）说明还有许多泰州门人未被万斯同收录。

11 关于《明儒学案》改序与原序的关系，可参见吴光《〈明儒学案〉考》，《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1013~1014页。

12 《黄宗羲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按：黄宗羲此言实来源于会稽人陶望龄。据陶氏《与何越观》书云：“我朝别无一事可与唐宋人争衡，所可跨跨其上者，惟此种学问，出于儒绅中，为尤奇伟耳。”（《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132页）“此种学问”，即宗旨分明的心性之学。

13 关于“讲学”“会讲”“讲会”之间的联系及异同，参见钱明《講学と講会——明代中晩期の中国陽明学派を主軸として》，载小路口聡编《語り合う〈良知〉たち》，（东京）研文出版，2018年版。

14 刘鳞长，字孟龙，号乾所，福建晋江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郎中。刘宗周对其很是推崇，尝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作《答刘乾所学宪》曰：“领大教，极足开我固陋之见，于高明所见尽是无疑。……读来教，旷若发矇矣。”（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3册，文编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67页）《浙学宗传》已于此前三年刊刻，故刘宗周极有可能读过此书，并且还认同刘鳞长的编纂方针。或者可以这么说，刘鳞长以心学为宗的“浙学”概念，也许受到过大儒刘宗周的某种启示。

15 按：周汝登的《王门宗旨》《圣学宗传》等著述，可以说是开了中国学术史之先河，也是心学化之史学形态的代表。

16 按：全书共收录宋明时期的浙江学者41人，其中有6位是浙西人，即张九成、康邵、邵经邦、郑晓、许孚远和陈龙正。

17 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1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4页。

1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61页。

19 按：蔡、汝楠父亲蔡玘（字玉卿，号夷轩），尝“游甘泉翁门，序《新论》、《心性图》（皆甘泉所撰），甚有期许。继而门人陆元静谈阳明翁之学，喜甚，欲买舟入越（指绍兴），会闻两广行，未果。日取其（指阳明书）书沉浸之，而命汝楠卒业于天真（指杭州天真书院）。”参见董平编校整理《邹守益集》卷二四《延平府同知封中宪大夫夷轩蔡公墓碑》下册，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页。故汝楠之学有折中王湛之倾向。

20 21 蔡汝楠：《自知堂集》卷二十《致张按察使浮峰先生》、卷十八《致孙蒙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7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02、671~672页。

22 比如张元忭不仅独立完成了十卷《馆阁漫录》和五卷《云门志略》，而且还与孙鑛纂修了五十卷《绍兴府志》，与杨惟新纂修了十六卷《会稽县志》，与张元复增补了二十卷《广皇輿考》等史地方面的著作。其长子张汝霖特设读史社，使读史、研史在晚明的浙东地区蔚然成风。后张岱又继承了祖父张汝霖的读史精神，一生以著史自任，第一部史学著作《古今义烈传》完成于崇祯元年，直至去世还在刊刻《越人三不朽图赞》。张氏祖孙四代，皆与阳明学有关，且都有志于史学，这就说明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所谓“阳明学派下边没有讲史学的人，在整部《明儒学案》中，只有唐荆川一人讲史学，可是他不是阳明学派里一重要的人”的论断是失之偏颇的。至于季本，据黄宗羲说：“先生悯学者之空疏，祇以讲说为事，故苦力穷经。罢官以后，载书寓居禅寺，迄昼夜寒暑无间者二十余年。而又穷九边，考黄河故道，索海运之旧迹，别三代、春秋列国之疆土川原，涉淮、泗，历齐、鲁，登泰山，踰江入闽而后归，凡欲以为致君有用之。”（《黄宗羲全集》第7册，第308页）他著有各类经史著作一百二十卷，应属阳明门下的经史学家。

23 “近世”之称，有用来指明清的，也有仅指清代的，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则以“近世”指宋元明清；日本学者后遂以“近世”称宋元明清，而以“近代”称清末以后。参见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页。

24 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9～210 页。

25 吴震：《从宋明理学视域看“浙学”的多元普遍性》，《浙江社会科学》2018 年第 9 期。